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王日根 著

明清海疆政策与 中国社会发展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王日根 著

明清海疆政策与 中国社会发展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王日根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

(中国经济史丛书/陈支平主编)

ISBN 7-211-05138-8

I. 明… II. 王… III. 海疆—政策—研究—中国—
明清时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1756 号

中国经济史丛书

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

MINGQING HAIJIANG ZHENGCE YU ZHONGGUO SHEHUI FAZHAN

作 者: 王日根

责任编辑: 黄须友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插 页: 4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7-211-05138-8

定 价: 3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的结题成果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

经君健 郑学檬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一件有多方面意义的举措。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之一，闻之无不倍感鼓舞。经济史学既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所以经济史学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曾是国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在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就曾起过重要作用。多少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道路时曾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而站得更高，并在观察革命的根本问题时，能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角度去反思、去剖析，准确地把握国情，科学地作出判断。所以，要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就离不开中国经济史研究，过去如此，今后也是如此，事之必然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某些经济史领域，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在一些重大的学术讨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虽然这些学术问题的理论思维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仍不能否认其振聋发聩的作用，令学术界“悟诸未悟者”。但是更多的经济史学者，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遵循经济史学自身的规律，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各个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他们的工作，不仅为后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史料基础，而且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

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突破了“左”的、极“左”的思想禁锢，重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迎来了学术界的春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建设主旋律的推动下，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硕果累累，新人辈出。年长的学者老树开花，总结多年的积累，写出长期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中年学者思想成熟，精品迭出；特别是日益增多的青年学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好成绩，有厚望焉！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国外史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中外学术文化、教育交流的频繁，老、中、青学者都以开放的、求实的态度吸收外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因而使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的扩展。

在以上所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诞生了，一如雕龙跃笔海，彩凤栖文峰，令同行艳羡不已。这套丛书是百家争鸣的园地，是经济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施展才华的空间。我们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既有以实证为基础，运用多种方法的扎实研究，也有逻辑严密、精辟深邃的理论探讨。希望这套丛书在学术上能做到兼收并蓄，并以多种风格的论著并存为特色，而严谨的学风则应该是丛书最重要的选择标准。

“青春去住随柳条，欲寄来人以为信。”祝贺“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的出版，并相信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精品文库，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2005年6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明代的海防政策与阶段性	(34)
第一节 明初海防的目标、政策与效果	(35)
第二节 明中叶海防的形势、政策与效果	(72)
第三节 明后期海防的任务、政策与效果	(132)
第二章 清代的海防政策与阶段性	(141)
第一节 全国统一前的海防任务与对策及效果	(141)
第二节 康雍乾时期的海防政策调整及其效果	(153)
第三节 嘉庆以后的海防政策及效果	(202)
第三章 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238)
第一节 政治外交支配下的朝贡贸易及效果	(238)
第二节 外松内紧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对中国的影 响	(254)
第三节 民间海上贸易与政策因应	(272)
第四节 明代海洋贸易政策的思想基础及其失效	(317)
第四章 清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322)
第一节 满族统治与民族危机意识下的“重防其出”政策	(322)
第二节 南洋贸易的“一波三折”	(342)
第三节 四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	(360)
第四节 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	(373)

第五节	海禁政策的效果·····	(383)
第五章	明代海洋移民政策的演变·····	(388)
第一节	明代海洋移民的种类·····	(389)
第二节	明王朝对海外移民的认识及对策·····	(402)
第三节	明代海外移民的规模与分布·····	(411)
第六章	清代海洋移民政策的演变·····	(415)
第一节	清初禁绝海洋移民政策及效果·····	(415)
第二节	近代社会变局与海洋移民及政策·····	(462)
第三节	晚清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	(470)
第七章	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	(477)
第一节	明清政府海洋管理政策的出发点·····	(477)
第二节	海禁政策的执行与影响·····	(484)
第三节	“禁海”与“开海”的天平摇摆·····	(490)
结语	·····	(502)
主要参考文献	·····	(507)
后记	·····	(515)

绪 论

我们考察明清时期的海疆政策，侧重于海防政策、海洋贸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三个方面。由于海洋贸易政策有时是海防政策的派生物，海洋移民政策同样是在服务海防政策的前提下制定的，因此海防是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明代以前，海上安全较有保障，而到了明代，一方面遭遇到海上国内反抗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遭遇到日本战国时期内乱的延伸影响，出现了严重的倭寇骚扰现象，这两方面都是明代出现的新问题，海洋政策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沿海地区也逐渐被纳入封建统治者的视野。统治者起初是把陆上的防御措施应用于海上，但是海上防御存在与陆上防御不同的特点。又由于海上威胁逐渐南移，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封建政府对海上形势的认识总是存在各种障碍。海疆政策常常偏离封建政治的要求，也常常以损害沿海地区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海疆政策时常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总览海洋政策，我们觉得其中存在着逐渐合理化的过程，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即海疆政策科学性的缺乏。

中国人其实很早就有了“海”的概念，《说文》中这样解释“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这与今日所谓“承受大陆江河流入、地球上最大的水域”的定义基本一致，海是天地最大的水域，接纳百川，承受大陆江河之流水。当然，说海是形声字，不如说成是会意字更合适，“每”在上古时期，是指氏

族中年龄最大、生育儿女最多的女性，用“每”做“海”的组字部件，与“海”“纳百川”为“天池”的意义不无关系。

在古人的心目中，海是大地的尽头，而大地是方的，环绕大地四边，必有“四海”，所以“海”被引申为“大地尽头”，海在被视为大地边缘之外的水域时，接近于海的地方也被称之为海，如《山海经》中有“闽在海中”的说法，《荀子·王制》中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这里的北海就是指北边蛮荒绝远之地。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中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处的“海内”，指的是四海围绕的中央国土。由此义引申“海”字又有国境的意义，如“海关”、“海外”、“海口”等。

《周礼·司寇刑官之职·大行人》说：“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根据与京畿的距离的远近自然划分出九等不同的等级，这是与周当时的自然、交通等状况相联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每五百里”就成了一个虚数，但是等级的区别却总是存在的。

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中，中国乃天下之中，中国的疆域覆盖及于四海，边陲地带乃蛮夷戎狄诸部落，属“化外”之地，因此，“天下”是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的，是包含了“中国”（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和“四夷”边疆在内的一个文化单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建立在文化秩序上的天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疆域观念或地理观念。按先秦天下观的说

法，天下是有层次的天下，天下的方位（中央和四方，“中国”和“四夷”）和层次（五服或九服）可以无限地向外延伸，所以，作为天下中心的华夏文化，理论上也可以以自己为中心无限地同化外围。同时，中国传统天下观中的“天下”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认知对象。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代表“天下”的概念如九州、五服、四海等，无一不是将宏大的“天下”视为一个整体。如此，天下的统一就不仅仅是中原的统一，而且还应该是“抚有四夷”的政治大一统。这就为历代的边疆经营确立了根本的政治目标和原则。

到汉代，司马相如提出：“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① 这是说，“四夷”之民盼望王者的一统，也与中原之人一样迫切。因此，天子理应“安近而绥远”，其责任不仅包括在中原，而且应及于四夷，即“多事四夷”，不断地把王化向外延伸。于是有作为的统治者把向四边扩张疆土看做自己的伟业，经营边疆是王朝伟功的重要体现。

汉代以后，中原王朝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逐渐衍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价值标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也多以天下为怀，将统一天下理所当然地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追求。《容斋随笔》卷三有一篇叫“四海一也”，洪迈这样解释说：“海一而已，地之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所载四海，盖引类而言之。《汉（书）·西域传》所云蒲昌海，疑亦淳居一泽尔，班超遣甘英往条支，临大海，盖即南海之西云。”洪迈认识了西高东低的地理形势，强调了四海为一的

① （汉）桓宽：《盐铁论·备胡》。

说法，反映了古人对大海已有一定的认识。

后来居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原来曾经有些居住于中原，只是因为政治军事斗争才外迁，反之，有时他们也内迁，因此，古代民族的地域界限既清晰又模糊，中原王朝虽明确认识到边疆问题的核心是“四夷”问题，但区分“华夷”的根据又不在地域之别，而是重在经济文化的差距。

民族的发展呈现出部族民族、种族民族、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历史形态的演变。在中华民族史上，“诸夏”与“戎狄”之分，实质上乃经济方式与文化（农业经济文化与游牧渔猎文化）的不同和差距，也就是说，“夷夏观”是以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准，具有推崇文化的基本内涵，其文化共性在于对“天下一统”的强调，和对“天下一体”的认知。而“夷夏观”中“夷夏之防”与“夷夏一体”两种互为补充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以夏变夷”思想，从根本上为中国传统的边疆经营提供了思想指导。

经济上生活方式、风俗习俗、文明程度之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伦理上的反差都成为决定中原与边陲政治关系良否的重要因素。

但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却共存于华夏这面大旗下。王朝统治者常常以“和合诸夷”作为国家兴盛富强的表现。政治上的“羁縻”统治，经济上厚往薄来的互市贸易，文化上的积极输出，均力求于“润物细无声”中将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输出到边疆，使四夷受到中华礼仪道德、文物制度的浸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就具有了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双重意蕴。不同民族表现出相互的宽容和接纳，彼此具有包容性和消化能力。中华礼乐制度逐渐为“四夷”所接受，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历史上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

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等，最终都得到汉文化的消融化解和改造，中华文化由此更加发展壮大。

文化的统一基本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协和万邦”是准则，通过政治上的德治，礼义上的示范，最终实现“王化天下”的理想。作为王，天子不是仅仅让中原享受发达的礼乐文明、文物制度，而将“四夷”弃之不顾，而且要“合天地所伏载，日月所照临”，不论远近，他都有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不仅要让中国百姓过上文明富足的生活，而且要“抚荒外之国，舒皇风于远服”，“德润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认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王道”，才真正实现了王道政治。

这种大同理论和“德治”理论，从根本上规范了中国传统边疆经营上的价值追求。这就是，重“和合”以及礼义教化，而将争斗与武力运用视为有违天人之道的“变态”。其反映在边疆经营上，就是必须以中原的文明道德的政治秩序为表率，对四夷边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字小以仁”，“导人以善”，“宣扬朝宪，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其心”，从而实现“区宇守一，阴阳顺序”，“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的天下秩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追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才能对边疆民族实行以“羁縻”、“怀柔”为核心的政策，中华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维系各民族团团结的精神纽带。

历代封建王朝为实施对广大边疆地区的治理，特别重视凭借灵活高超的政治艺术，通过“羁縻”、“和亲”、“朝聘”、“封贡”、“册封”等安抚、怀柔措施，对边疆四夷“节之以礼”，建立起朝贡体系，顺其自然地、和平宽容地将边疆民族纳入大一统体系^①。

^① 孙建民：《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中央的羁縻通常是以赐予边疆少数民族“封号”为标志的，归顺的四夷对中央表示臣服，同时就可以挟中央之威统治地方，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时是通过寻找代理人的办法实现的，有的甚至可以不设郡县，仍保持原有的状态，只要承认中央政府的管辖权，自主和自治的色彩非常浓厚。

为了赢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的臣服，同时也为了谋得少数民族本身成为中央王朝的边防力量，中央政府经常还采取联姻与和亲的办法，以冲淡民族偏见，部分减少民族的隔阂，推动民族同化。

实际上，这种招抚怀柔政策是以牺牲中央的权威为代价的，包含着对现实的无奈承认、让步和妥协。但总体而言，其体现了因地、因时制宜的政治艺术。反映了对边疆的宽容和灵活态度，以及中央政府保证帝国安全和边疆稳定的努力。这对边疆的渐进发展和稳定是卓有成效的。

朝贡贸易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更加明显，厚往薄来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增强边疆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明太祖曾下旨礼部：“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①除了回赠之外，历代封建王朝还往往对承认中央权威的边疆民族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由于朝贡有时较战争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有的少数民族也会多有朝贡，以获得经济利益。不过，这确实也起到了稳定边疆的作用，也对边疆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帮助，或许在这种交往中，少数民族通过慢慢接受中原王朝的物质文明、礼仪道德、文物制度，逐渐融合到中原王朝体系之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四。

顾颉刚先生在研究了历代边疆政策后指出，边疆政策大体分放任和分化两种。前一种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积极进行“王道”式的道德感化，二是哪里出了乱子就将其放弃，三是自然的同化。无论如何，“以德怀之”是主流意识。有时中央王朝对边疆片面求安而不思发展的成俗也颇不利于边疆的发展和进步，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边疆的稳固，特别是外敌覬觎的时候。

中国传统治边理念虽然把实现边疆的统一和治理作为“大一统”的题中应有之义加以规范，但骨子里无疑是轻视边疆的，并未把边疆经营提高到应有的战略地位。如在边疆与内地的关系上，重内地而轻边疆，满足于朝贡和虚幻的“尊王攘夷”等；在“安边”与“强边”的关系上，更多地强调“安边”而不是强边和发展边疆；在军事战略上，大多时候奉行消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如兵力配置“内重外轻”，汲汲于“修墙”与“固塞”，奉行“虚边”政策，有事方从事于边疆等等。这些认识及与之相应的边疆战略，实际上是怕“生事”、怕矛盾，无意于积极缩小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①

因此，传统的边疆经营虽有成就，但代价颇高，教训也不少。因为过分强调稳定，以“弱边”牺牲边疆的发展为代价去换取安定，只能是低层次的安定，甚至不能从根本上求得边疆稳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的治边目标。军事战略上的消极防御，往往造成边防空虚，不能未雨绸缪地主动解决“边患”，一旦出现危机，则只能手忙脚乱地思考因应之策，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边疆经营上的被动，导致“边患”不断，战争频繁。同时，片面追求稳定甚至是满足于一时的安定，对边疆的治理往往流于松

^① 孙建民：《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散，不能提升边疆治理的层次，结果造成边疆与内地的关系不时出现动荡，甚至前一个朝代已经被纳入大一统政治体系的边疆地区，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和巩固，在后来还往往出现反复。

其次在价值认识上始终未冲破平面的边疆价值观，缺乏积极的开边意识。如认为边疆地区文不如华夏，地不可事耕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①，甚至认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②。这些言论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传统治边理念对边疆价值的判断，只是以能否发展农业经济，能否为中央政府提供税收为最高标准。相反，积极经营边疆的活动，则被认为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传统治边理念中价值认识的偏差还影响到历代王朝对陆海边疆关系的态度。虽然在传统治边理念中陆地边疆经济价值不大，但因为这些地区一直形势复杂，常常对大一统政权构成挑战，经营起来至为艰巨，所以历代王朝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不得不予以足够的重视，相比而言，因为来自海疆的威胁基本上不存在，而中原王朝以农立国，“得之无用”的偏见更为强烈。于是，除了极个别时期外，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没有将海疆纳入边疆经营战略之中。如清朝在收复台湾后，面对西方殖民者加速殖民扩张的严峻形势，仍然不能对海疆经营予以足够的重视，造成中国海防空虚。到了近代，西方侵略者正是主要从海上打开中国国门，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灾难命运。

中国传统边疆经营具有阶段性、渐进性，表现在疆域的发展上是一个合乎自然的过程，在长期的朝代更替过程中，随着边疆的安定与发展，疆域渐次巩固和扩大，从而避免了罗马式的扩张

①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② 《后汉书》卷八〇上，《文苑列传》。

主义道路。

中国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在成长方面，是一个不断充实和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华夏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一个阶段紧接着另一个阶段，由中心的点，进而扩大为核心的面，再由核心不断向外辐射，向外扩散，形成更大的中心，并奠定下一阶段继续扩散和凝聚的基础，如此重复进行，逐渐将边缘消融为新的核心。

“天下”本来就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别的有层次的天下。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大历史实际就是，当时的“中国”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结合地带和牧业区，中原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反差，使二者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这样在全国均推行郡县制这类“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往往不切实际。于是必须在“大一统”的模式下探寻具体的运行模式，即“通权达变”。如“外蛮夷”与“内蛮夷”的区分，“生番”与“熟番”的区分等。如唐代的羁縻州县设置，如元明清的土司制度等都构成了治理边疆的变通有效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明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亦体现了治理的成效，边疆与内地走向一体化，边疆被不断地变成了内地。^①

由于边疆幅员广，区域自然和社会差异巨大，中央王朝经常必须因时因地采取灵活策略。在北方，时常是武力解决的办法，而在南方，则往往以招抚和怀柔的措施为主。

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确立了“大一统”的坚定信念，张扬了国家统一意识。历史上包括边疆民族在内的各族统治者，都把

^① 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0～582页。